



貴州大學 校史 1902—2010

《貴州大學校史》編委會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贵州大学校史

(1902—2010)

贵州大学校史编委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大学校史:1902~2010 /《贵州大学校史》委员会编写. --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81126-551-4

I. ①贵… II. ①贵… III. ①贵州大学-校史-1902~2010 IV. ①G649.28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6306号

贵州大学校史 1902 - 2010

编者:贵州大学校史编委会

责任编辑:钟昭会 周清

出版发行: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刷: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29.5

插页:26

字数:680千字

版次: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ISBN 987-7-81126-551-4

定价:69.00元

版权所有 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0851)6742302

贵州大学校史编委会

顾 问:龙超云 姚小泉 郑强

主 任:陈叔平

副主任:封孝伦 谢田凯

编 委:李碧华 杨正元 蔡显沛 张槐礼 罗开阳 杨履端

前 言

贵州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贵州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教育部共建高校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贵州大学创建于1902年8月，历经贵州大学堂、省立贵州大学和国立贵州大学时期，1950年10月正式定名为贵州大学。1951年1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校名。1953年因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而停办。1958年恢复重建。1993年贵州人民大学并入。1997年8月，原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为贵州大学。2004年8月，贵州大学又与贵州工业大学合并组建为新贵州大学。同年1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签订协议共建贵州大学。2005年9月被批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贵州大学在百余年的办学历程中，虽然校名几经更迭，校址几度变迁，历经沧桑，屡经磨难，但百年传承，薪火相继，始终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以“兴学育人”为根本，以立足贵州服务地方为己任，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坚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培养、孕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特别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鉴往所以训今。”为了反映和记录学校的发展历程，总结办学成绩和经验，以供今后发展借鉴和参考，学校决定编写一部完整的贵州大学百年校史。根据陈叔平校长的意见，2003年3月成立了由李建军副校长负责的校史编写组，成员有周载章、蔡显沛、张槐礼、刘锡堂、**陈通茂**、**康忠林**、毛名勇、杨军昌、龙云湖、白朗、王东等同志。其中，**陈通茂**、**康忠林**、毛名勇负责续写原贵州农学院校史1988年1月至1997年7月部分，白朗负责协调各学院校友录的编写工作，王东负责材料打印等工作。

这部校史以纵横式相结合的体例编写：纵为时间（阶段），横为事项（事件）。阶段的划分，以学校发展的历史阶段、特征、标志或重大事件为依据，以时间顺序为主线进行编写。本着为学校的过去和未来负责的精神，力求坚持实事求是、“据事直书”的原则，用平实的语言，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历程，尽力避免重大疏漏。鉴于合并院校过去已编写有独立的校史，故在本校史中未加细述。

这部校史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贵州大学堂、省立贵州大学两章，主要取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和学校档案馆、图书馆等保存的史料，并参阅使用了黔人撰写的有关论著，由蔡显沛、杨军昌同志编写。1941年至1953年间的校史内容，以1987年写成的《贵州大学校史》（主编王临池，副主编曾昭毅）和《贵州农学院校史》（主

编冯泽，副主编康忠林、周文安、易家岑、王兆旭)为基础，进行了修改、订正和补充。1958年至1984年间的内容，在原《贵州大学校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1985年至2005年间的内容为续写部分，由蔡显沛、周载章、张槐礼、刘锡堂、龙云湖同志完成初稿。全书由蔡显沛、周载章同志负责统稿。《贵州工业大学校史》以1987年写成的《贵州工院校史》(主编黄季钧，副主编顾熙民、帅永安)为基础，由袁华俊、韩三发、顾熙民、李泉珍等同志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

为迎接贵州大学105周年校庆，2007年8月，由贵州大学出版社以贵大丛书的形式分三个分册出版了《贵州大学校史(1902—2005)》、《贵州农院校史(1941—1997)》、《贵州工业大学校史(1958—2004)》。校史自出版以来，受到多方好评，但因编写时间仓促等原因，尚有遗漏和不足之处。根据校领导的意见，校史馆校史编辑室组织人员对三个分册进行了拾遗、补缺、正误。2009年成立了校史修订小组，由范泽均任组长，李碧华、杨正元任副组长，成员有蔡显沛、罗开阳、袁华俊、李泉珍、张槐礼、周载章、孟昭和，并开始收集资料，2010年着手修订工作。其中，蔡显沛负责贵州大学校史部分，充实了有关贵山书院、贵州大学堂、国立贵州大学等时期的内容；罗开阳负责贵州农院校史部分，充实了教学科研、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内容；袁华俊负责贵州工业大学校史部分，充实了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内容。谢波、毕克荻参加了此项工作。修订后的校史，史料更加翔实，内容更加完善，表述更加准确。

为迎接110周年校庆，学校决定将“十一五”(2006—2010)期间学校改革建设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主要成就写入校史。在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由校史馆负责具体组织工作，2011年11月组成了由李碧华、杨正元、蔡显沛、杨履端、张槐礼、孟昭和、罗开阳、李昕昌、张成霞、王华等同志参加的编写组，并着手收集资料和编写工作。时值寒冬，又逢春节，但编写组成员不辞辛劳，于2012年2月完成了增补的校史第十章初稿。全章由蔡显沛同志负责统稿。

由于编撰者的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务望读者不吝指正。

在《贵州大学校史》(1902—2010年)增订本完成付印之际，谨向校史编写的同志和工作人员，向学校档案馆、图书馆及有关提供资料的单位，向编写原《贵州大学校史》、《贵州农院校史》、《贵州工业大学校史》的同志及校史中引用相关论著的作者，向积极协助、热心支持这项工作的同志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者

二〇一二年三月

序 一

贵州大学诞生 105 周年如期而至。创办于 1902 年的贵州大学，其诞生即带有清末“新政”色彩，记录了那个风雨如晦时代的特征。从那时起，贵州大学历经变化，名称变更，校址迁移，建制屡遇分合：1928 年，曾是地方政府倡办的省立大学；1942 年，正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时，她又是当时省内的国立综合大学，支撑着西南边陲之一隅的高等教育，在风雨飘摇的政局中履行着培养人才的责任。

贵州的高等教育百年，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期，每期大约各 50 年。解放以前，国家多难，民不聊生，高等教育的创办与维继自然备尝艰苦，贵州大学的惨淡经营、举步维艰只是一个缩影。在那样的年代，虽略有长进，但也属筚路蓝缕，令有志之士扼腕叹息而已。

贵州大学真正进入发展时期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事。50 年代初期新中国建立，贵州大学已经有工学院、农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商学院 5 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1951 年 11 月，毛泽东主席亲笔为贵大题写校名成为贵州大学发展史上值得永远珍视并纪念的大事。以后，随着党和国家教育路线与政策的调整与变动，贵州大学曾于 1953 年因国内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而停办，直至 1958 年才恢复重建。简言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 20 余年间，贵州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受极左思想路线的严重影响，虽有发展但甚为缓慢。

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初，自党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国策以来，贵州大学同全国高等院校一样，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期。1993 年，贵州人民大学并入贵大。1997 年 8 月，原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重组成为新的贵州大学。2004 年 8 月，贵州大学又与贵州工业大学再度合并，组建为现在的贵州大学。此时的贵州工业大学也已合并了贵州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贵阳煤炭工业学校、贵州省城乡建设学校。同年 12 月，贵州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签订协议共建贵州大学。2005 年 9 月 8 日被批准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为纪念百年来贵州大学在贵州经济发展和文化昌明史上起过的重要作用与做出的巨大贡献，总结学校办高等教育的经验，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2003 年初，贵州大学党委和行政成立了校史编写组，校长陈叔平同志亲自指挥协调。几年来，校史编写组的同志不辞辛劳、焚膏继晷，终于完成了眼前这部近百万字的《贵州大学百年校史稿》。书稿出版付梓之际，正式命名为《贵州大学校史》。

通观这部史书，我们可以回顾过去百年来贵州大学走过的风雨历程。这一百年见

证了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从危亡走向兴盛，从贫弱走向富强。这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的伟大的历史变革。因此，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宝贵的经验；展望贵州大学的未来，我们更有百倍的信心。

通观这部史书，我们可以感念那些为贵州大学和贵州高等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新老知识分子，以及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教育工作者和领导者。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谱写了贵州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不巧业绩和辉煌篇章。百年辉煌，生动记载了中华民族和贵州人民以教育推动民族复兴、一代接一代努力实践的办学理想。

通观这部史书，我们可以缅怀那些为兴办贵州高等教育事业不惜忘身输家，以及在大学校园中传播爱国主义、科学与民主思想并为此毕生奋斗的仁人志士。一所高等学府，最值得珍视的就是它的人文精神传统。一个民族所赖以进步与发展的，就是人的价值理想可以因教育而薪火相承、代代不已，直至久远的未来。

通观这部史书，我们可以前瞻高等教育在培养德才兼备人才、最终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的巨大潜力。一所高等学府，其教育目标必须将人的优秀素质的培养放在首位。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是为了造就一大批品学兼优、志向高远的人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应该以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为学习目标，以所学到的知识技能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独立而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公民素质参加到将来的社会中去。贵州大学在书写新的百年辉煌的时候，一定会秉承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实、更属于未来的优秀传统，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贵州大学校史》出版之际，出版者要我作序。浏览书稿后，写下所感所悟。是为序。

龙超云

二〇〇七年七月

注：龙超云同志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贵州大学党委书记，现任省人大副主任。

序 二

贵州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准备出版百年校史。盛世修史，实为大事、喜事、幸事。历史记录社会的演变，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又和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紧密相连。1896年，甲午战争之后，贵州人李瑞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倡议“自京师以及各府州县皆设学堂”，遂有包括1902年贵州大学堂在内的一批西式学堂的创立。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又确定了一批包括国立贵州大学在内的国立大学。这些事件，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国力积弱、饱受侵略欺凌、痛定思痛后图强求变、民族觉醒的产物。“五四”运动、抗日救亡、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从那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直至“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无不在中国的大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贵州大学亦然。因此，出版贵州大学百年校史，不仅反映了贵州大学断断续续、分分合合的演变过程，而且对人们了解那个时代也有相当价值，故是为大事。所谓喜事，乃贵州大学百年校史是贵州大学出版社正式成立后出的第一批图书之一。在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志的亲自关心下，贵州大学出版社于今年二月被正式批准成立，结束了贵州没有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以这样的方式来庆祝出版社成立，当然是一件喜事。由于历史原因，今天的贵州大学各组成部分都没有完整系统地积累、保存档案资料，而要把今天的贵州大学与1902年的贵州大学堂以合理的逻辑连接起来以形成百年校史，更需要大量令人信服的史料，这部校史初步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是为幸事。

我与贵州大学结缘，始于六年前。2002年初，我离开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受命赴黔出任贵州大学校长。在此之前，我对贵州大学并不了解，对贵州的了解也只限于红军长征时的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和人称“文军长征”的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办学等故事。更早一些的就是那位从浙江余姚走出来的王阳明，他在贵州修文龙场悟道，再将其“心学”从贵州传向全国。王阳明有一篇《瘞旅文》，收录在《古文观止》中，其中的“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孤身一人来到贵州工作的。工作中和工作之余，有大量的时间与贵州大学校内外的学者和社会各界各类人士接触。当初贵州大学为我准备的办公室内恰好有一部《贵州高等学校校史汇编》。在广泛的交谈和阅读中，我体会到，贵州不仅有神奇秀美的山水，有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里称得上藏龙卧虎、人杰地灵。贵州大学的校园中，高学之士云集，其间也偶有闲云野鹤——一些淡泊名利，惟以学问为意，颇能怡然自处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贵州和贵州大学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深刻。2003年，我与几位同事商量重修校史，找来几位志同道合且有这方面专长的老同志着手编写工作。2004年，新贵州大学组建，我续任校长。

在进一步了解原贵州工业大学的发展历程以后，更增强了编写一部新的贵州大学校史的信念。这项工作得到了贵州大学党委书记龙超云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贵州大学目前是贵州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学科最全、办学层次最高的大学，它的历史也是贵州高等教育史的一个缩影。大学有大学的共性，这就是她培养人才、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传承文明的一般功能。大学还应该有个性的大学，贵州大学的定位是立足于贵州，围绕贵州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利用贵州的资源，依靠贵州的人才，做出有贵州特色的大事好事。我们的贵州，虽属内陆多山的省份，但贵州人士都能心怀天下，服务国家。贵州大学的毕业生，不仅是贵州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之一，他们中亦有许多人走出贵州，遍布祖国各地，成为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细读贵州大学校史，你会发现内容丰富而精彩，体现了学校的定位和特色，把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贵州大学百余年教育史，正是一部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历史，从中，我们看到了百年树人的传统、百年树人的成就以及百年树人的艰辛。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在不断变化，大学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教育手段也会相应地不断调整。但大学的基本功能不能变，大学的精神不能变，大学因服务社会而存在的基本价值观不能变。“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大学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要让一代又一代的贵大人了解熟悉贵州大学的历史，从中得到感悟，受到启迪，为贵州大学谱写更加精彩的新篇章。

贵州大学的先贤们，我仰望他们，追慕他们。今天在贵州大学工作的教职工，我敬佩他们，依赖他们。多少年来，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孜孜不倦、无怨无悔地为贵州大学的发展默默奉献，令我时时感动。因为他们的艰辛付出和忘我的精神，我们的贵州大学才有今天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校园中的一花一草、一砖一瓦，无不凝聚着他们的心血，无不映照出他们的理想和期盼！我以能够在他们耕耘过的这块土地上继续撒播培育文明的种子而感到莫大的骄傲！

最后，我要感谢校史编写组的同志们，四年来，他们殚精竭虑、默默无闻地潜心工作，或四处奔走搜集资料，或夜以继日伏案写作，才得以让我们看到眼前的这部校史巨著。这其中的甘苦与奉献，了解者寥寥，我的崇敬和感激绝非这里的片言只语所能表达。

《贵州大学校史》即将付梓，编修者嘱我作序。惶恐之余，百感交集，勉力为文，以表心声。是为序。

陈叔平

二〇〇七年七月

目 录

前言	(1)
序一	(1)
序二	(3)
第一章 清末贵州大学堂	(1)
第一节 贵州大学堂的前身	(1)
第二节 清末教育改革	(7)
第三节 贵州大学堂的成立	(9)
第四节 贵州大学堂的规制	(10)
第五节 贵州大学堂的嬗变	(16)
第六节 对贵州现代教育的贡献	(19)
第二章 省立贵州大学	(22)
第一节 省立贵州大学的建立	(22)
第二节 《贵州大学计划书》和《贵州大学规程》	(24)
第三节 学校机构与系科专业设置	(28)
第四节 在黔省政局剧变中停办	(31)
第三章 国立贵州大学	(35)
第一节 国立贵州农工学院的成立	(35)
第二节 国立贵州大学的成立	(39)
第三节 办学基本条件建设	(44)
第四节 管理机构设置及其职责	(47)
第五节 院系概况及课程设置	(49)
第六节 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	(56)
第七节 办学规模与学籍管理	(58)

第八节	党团组织和学生社团组织活动	(65)
第九节	师生民主运动	(69)
第十节	护校运动	(81)
第四章	共和国初创时期的贵州大学	(83)
第一节	军事接管贵州大学	(83)
第二节	解放初期的反匪特斗争	(87)
第三节	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运动	(88)
第四节	建立党团组织	(90)
第五节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92)
第六节	教学改革	(93)
第七节	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停办	(96)
第五章	恢复重建贵州大学	(99)
第一节	贵州大学的恢复	(99)
第二节	艰苦创业谋发展	(101)
第三节	接收归国华侨学生	(104)
第四节	“反右倾”和甄别平反	(105)
第五节	认真贯彻“高教六十条”	(106)
第六节	思想政治教育和一系列政治运动	(109)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贵州大学	(112)
第一节	“文革”动乱及其危害	(112)
第二节	招收工农兵学员	(115)
第七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贵州大学	(117)
第一节	转移工作重点	(117)
第二节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123)
第三节	教学改革与教学管理	(129)
第四节	科学研究和成果推广	(132)
第五节	搞好后勤服务工作	(136)
第六节	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139)
第七节	对外交流与合作	(151)

第八章 四校合并后的贵州大学	(153)
第一节 四校合并组建新贵州大学	(153)
第二节 管理体制变革	(157)
第三节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165)
第四节 加强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	(180)
第五节 校园建设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	(187)
第六节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190)
第七节 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193)
第八节 重点学科建设和争进“211 工程”建设	(206)
第九章 实现“211 工程”建设的贵州大学	(211)
第一节 两校合并组建新贵州大学	(211)
第二节 省部共建贵州大学	(214)
第三节 进入“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216)
第四节 加快跨越式发展	(218)
第十章 步入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贵州大学	(222)
第一节 科学制定“十一五”发展规划	(222)
第二节 “211 工程”三期建设方案编制和重点学科建设成效	(225)
第三节 创新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	(231)
第四节 本科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提升	(234)
第五节 研究生教育	(244)
第六节 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	(249)
第七节 校园文化建设	(255)
第八节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266)
第九节 国际交流与合作	(274)
第十节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278)
附:贵州大学百年大事记(1902—2010)	(289)

第一章 清末贵州大学堂

第一节 贵州大学堂的前身

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公元1902年8月）创建的贵州大学，初名贵州大学堂，是贵州历史上以“贵州大学堂”命名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我国早期创办的迄今已有百余年办学历史的大学之一。

贵州大学堂的前身至迟可以追溯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建立的贵山书院。贵山书院又是在阳明书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一、贵山书院历史沿革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王杏（字少坛，浙江奉化人）出任巡抚贵州监察御使，兼摄提学副使之职。王杏到职后，鉴于热心求学的士子日益增多，原有的书院难以容纳，亟需增设书院。又应贵州名士、王阳明先生高足汤昇、陈文学、叶梧等人的请求，在贵阳建阳明祠和阳明书院纪念王阳明，于是筹措资金，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在贵阳城东建成阳明祠和阳明书院。二十五年（1546年），巡抚王学益改建于宣慰司学右。隆庆五年（1571年），巡抚阮文中、按察使冯成能迁建于巡抚署左侧（今贵阳市省府路30号邮电宿舍，亦称贵山街，俗称“六座牌”处），中三楹为阳明祠，后五楹为山斗堂，外为昭代真儒坊。明末，书院遭战乱毁坏。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巡抚曹申吉在原址捐资重建，“规模略具”，并置书数千卷于中，后为主持者揣去。二十一年（1682年），巡抚杨雍建重修，易山斗堂为后觉堂，置前后两庑十二楹以课士。二十八年（1689年），巡抚田雯重修，别建合一亭，传习轩五楹，集孝廉、诸生读书其中。三十一年（1692年），巡抚卫既齐增修学舍，躬为训课，捐资以备馆谷。四十

五年（1706年），巡抚陈诰亲课士于中。雍正六年（1728年），署巡抚祖秉圭修葺。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下令各省设立一所省会书院，以为省内书院之楷模，由朝廷“赐帑金一千两”，“资其膏火，以垂永久”。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巡抚元展成（天津静海人，贡生）奉旨拨帑银一千两，选定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阳明书院作为省会书院，增建学舍50间，于是年改名贵山书院。同时，聘请饱学之士担任山长（院长）和宿儒执教，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为教材。购置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一千余卷贮之院中，令诸生诵习。又置学田以资士子膏火。元展成还撰嵌字联相赠：

天地之性人为贵

风雨不动安如山

书院之头门额有“贵山书院”四个大字，左有雍正十三年某月，右有静海元展成书等字。自此以后，贵山书院成为黔中书院之冠。它办学条件最好，师资力量雄厚，经费充足，治学严谨，成为举人、进士的摇篮。贵山书院从创办之时至1902年创建贵州大学堂，历时167年。其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巡抚舒常、粮储道德隆进行了拓建，“百余间广厦、长廊焕然，改作椽题楹桷，气象一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贵州粮储道倭臣布捐资重葺，倭臣布自记：“现制头门三间，左为书办房五间，右为监院所三间，门内之西神宫三间，内房五间，客房两间，厢房一间；二门三间，内讲堂三间，堂左五斋，曰居敬尊闻赏奇晰疑各十间，聚学五间，堂右五斋，曰立诚知行各十间，问办五间，集思广益各六间。堂后山长内房三间，房东厨房一间，房西役房一间。左斋内尹公祠三间，阳明祠三间。缭之以垣。”同治八年（1869年），巡抚曾璧光进行过重修。光绪六年（1880年），巡抚岑毓英建有奎阁一座。经过不断拓建修葺，贵山书院各种用房日臻完善。

二、贵山书院著名山长

明清以来，贵山书院一直由学识渊博的学者主持，其鼎盛时期是乾隆、嘉庆两朝。乾隆年间，贵山书院先后有三位著名山长，即陈法、张甄陶、艾茂。他们主持贵山书院期间，培养人才甚众，后人称之为“三先生”，并立祠奉祀。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何泌、翟翔时又先后担任山长。至光绪年间，先后有王耘、张圣化、陈尧华、王国元、鲁百墀、周际钊、刘炜、寇秉钧、胡日宣、周之冕、黄卓元、黄芷衡、丁泽安等饱学之士任山长或主讲，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人品高尚，学识丰富，教法修明，以身垂范，诲人不倦，教育生员严格，琢育众多人才。

陈法（1692—1767年），字世垂，号定斋，安平（今平坝县）白云庄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巳恩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先后任顺天乡试、礼部会试同考官、刑部郎中、直隶顺德知府、山东登州知府，江南淮扬道、庐凤道、山东运河道、北京大名道等职。在大名任职时，因上疏为河督白钟山辩冤，且引

咎自责被滴戍边。获释后，陈法无意仕宦，时又因母丧丁忧回黔。乾隆十七年（1751年），陈法由贵州通省清军粮驿道朱近堂引荐任贵山书院山长达十年，造就了大批人才。陈法献身教育，服务桑梓，潜心治学。他认为，教育是“敦行谊以为风俗”的根本，是“育人才以备国家之用”的大业。他讲学精审，将课诸生讲稿整理成文，积二百余篇，辑为《敬和堂文稿》，又有《醒心集》30篇刊行。他激励士子“自今以往，士其益务无怠于学”。他治院有方，亲制《学约》9条，《学规》14条，严格规范学子，“申明学约，于科举俗学之弊，谆谆致戒”，循循善诱，学风整肃，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人才辈出。著名学者、诗人谢庭熏就出其门下。他师德高尚，爱生如子，把每年所得束修全部捐给书院，作为购置图书、津贴教师私课、补助贫寒学生膏火及年终返家的路费等用。据《平安县志》载：“先生掌教贵山书院十年，所得修脯，一无所取，为置书院膏火，数遣人往京师购置内版书贮院中”，因而学子感受其惠。在他逝世后，学子们自发组织“陈公会”，于每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陈法生日）在书院举行祭祀之礼，缅怀其高尚品格和捐金资学的功德。陈法是清代贵州著名的理学家，一生著述甚丰，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水利、诗文、教育诸方面，他精心研究程朱理学，著有《明辨录》以批驳陆王心学；所著《易笺》8卷，收入《四库全书》，是黔中学术专著入选四库的唯一作品，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还著有治河专书《河干问答》1卷、散文《犹存集》8卷、《内心斋诗稿》12卷、《塞外纪程》1卷。其诗入选《黔诗纪略》。

张甄陶（1713—1780年），字希周，一字惕庵，福建福清人。乾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任云南昆明五华书院山长5年，成绩突出，云贵总督刘藻（贵州人）特向乾隆皇帝上疏表彰其业绩，并举荐他任贵山书院山长，乾隆准奏特批，并特地颁诏给各督、抚，要求对各地书院“慎选山长，如果教术可观，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从此定下考核山长的成例。张甄陶博学多识，于天文、地理、乐律、兵法、水利河防及农桑方技之书，无不周览。著有《周易传文拾遗》、《尚书蔡传拾遗》、《诗经朱传拾遗》、《春秋三传定说》等专著。任贵山书院山长11年，课士有法，成绩卓著，贵州文风进步迅速，经朝廷议叙，给予八品府职衔。

艾茂（1722—1800年），字颖新，号凤岩，麻哈州（今麻江县）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乡试第三名，次年辛未科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继任国史馆纂修官，兼《文献通考》纂修官。艾茂是一个淡泊功名、不乐仕进的文人，由于身处文人相轻的翰林院，极不习惯官场生活，喜欢追求个性、热爱自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艾茂以养亲为名，辞官返乡，过上悠然自得的生活。不久，贵州巡抚周人骥慕其才名，聘艾茂任贵山书院山长。艾茂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在贵山书院执教期间，倾其所学传授弟子，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并重视学生的道德修养。由于教学有方，教学效果显著，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使贵山书院的学风发生了根本变化：士子学业精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己卯科乡试和庚辰（1760年）科会试中，贵山书院荣登科名者不少。清廷

得知艾茂在家乡讲学传教大有成绩时，申令嘉奖之余，特授予其侍讲一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艾茂奉召回翰林院，恰逢升迁好机会，但艾茂志不在此，对高官厚禄毫无兴趣。在他心目中，当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最为惬意，不用仰人鼻息，不用看人脸色，最终还是以乞养亲老为由，再次辞官归里。祖父病逝后，艾茂应云贵总督之聘，赴云南昆明五华书院主讲，历时5年。之后艾茂返回黔中，复主贵山书院达10年之久。艾茂是一个慧眼独具、有伯乐之才的教育家。他认为，“教人必先器识”，对士子智力的优劣、学习的勤惰及其理想情操，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因材施教。在艾茂的精心培养下，其门人品学兼优，为士林所瞩目。高足何学林、石赞清、胡万青、罗方五、严匡山、花杰、张桐轩等人学有成就，后来成为政坛、文场中的翘楚。由于艾茂对贵州文教的贡献，及其陶铸的学子多有成就，贵州巡抚及藩台多次向朝廷称颂其才干，希望朝廷不要将其调任，让其为家乡多多培养人才。清廷为此特对艾茂予以嘉奖，再次授予侍讲一职。艾茂晚年辞教返乡，息影林泉。艾茂一生著述甚丰，著有《易经入道》、《贵山四书集讲》、《贵山新草文集》、《联捷文稿》、《应制律诗》、《古文聚精录》、《宝珠堂诗集》等。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大多毁于咸同年间贵州的兵火中。艾茂是乾隆年间贵州著名的教育家，他以教育为职志，始终关心贵州文教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正是由于他对教育做出的特殊贡献，及其才高学博的人格魅力，学界对他尊崇备至，景仰有加。艾茂逝世后，贵山书院的学子把他与书院前任两位杰出的山长陈法、张甄陶合称为“三先生”，一起奉祀，让时人、后人缅怀这位著名的教育家。

何泌（生年不详—1808年），字邝夫，季衡，一字素园，何德新子，贵阳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丁未科进士，散馆后改庶吉士，官翰林院编修。因厌倦仕途，任编修未及一年便乞归乡里，愿为家乡培育人才。其时，钱塘人王湛恩任贵筑县知县，以振兴教育、培养人才为要务，闻何泌德行，邀他主讲贵山书院，聘为山长。何泌讲授经史诗文，深入浅出，娓娓不倦，并常与诸生研讨修身之德及治学途径，受到诸生爱戴，书院学风一新。何泌还邀请其乡试同年翟翔时担任书院监院，主讲古诗。他们二人密切配合，不仅躬行实践教人，又皆博览经史，工诗文，兼之王湛恩的大力支持，他俩在书院中进行教法改革，并整饬纪律，致使“士行蒸蒸日上，文学、科名日盛，贵阳人士遂冠于西南”。何泌能诗，其诗入选《黔诗纪略》。嘉庆十三年（1808年）何泌病逝，士林哀悼失去一位名师，其弟子门生感其恩德，将其入祀于贵阳城东抚风山麓的阳明祠，岁时进行祭祀。

翟翔时（1744—1810年），字审庵，号悦山，贵阳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中举后，四次进京会试不中，五十三年（1788年）获选贵阳府学训导。五十六年（1791年）受何泌之邀出任贵山书院监院，何泌病逝后受聘为山长。翟翔时善教，擅长引导学生。他教书与其他人不同，其特点是不急功名而重制行，总是教育士子注重道德品质修养，以教孝友、崇信义为先务。言行一致，以身垂范，诲人不倦，是翟翔时教书的另一特点。他常勉励诸生要“立心制行，以圣贤为己之学自期”。诸生如有过